

從產業轉型 看競爭優勢的重尋 香港回歸二十年

〔研究札記〕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Hong Kong Economy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fter 1997 [Research Note]

伍志豪*

Mark C H Ng

摘要

回歸後香港在國際性競爭力排名一直名列前茅。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經歷多次轉型，把握中國內地急速發展的機遇，成為了亞洲區內金融中心。但九十年代以來經歷多次金融危機，香港向高增值服務業轉型並沒有如預期般順利。在 2003 年簽訂的《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成為香港進一步跟內地經濟結合的標誌。在內地自由行的推動下，香港經濟持續增長，但同時亦增加了本港的經營成本、削弱了企

* 伍志豪 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系副系主任

收稿日期：2017 年 2 月 2 日；通過日期：2017 年 4 月 1 日。

業向高科技和高增值產業發展的誘因。在內地的香港製造商在規模、環境和政策限制下，大都只維持勞動密集以達至低成本的經營方式。內地經濟急速發展後，中港兩地原有的合作模式亦變得不合時宜，兩地企業在若干行業中更成為了主要競爭對手。中港兩地市場規模差距極大，吸引不少香港人才到內地發展，亦導致一些產業出現青黃不接問題。香港已非昔日的小漁村，而是一個亞洲國際都會。要推動香港經濟向前，香港必須思考如何在中國繼續保持開放政策和全球化的洪流中，發展自身優勢，把資源吸引到來，建立自己在中國、以至全世界的位置。

關鍵詞

中港融合、結構轉型、競爭優勢、創新

Abstract

Hong Kong is ranked as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Since the 1950s, Hong Kong has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its economic structure several times and captured the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ub in Asia. However, following the return of sovereignty to China in 1997, Hong Kong failed to transform into a high value-added economy as expected. The Clos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also facilitat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China and Hong Kong. Launched in 2004, the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also rebuilt the momentum of Hong Kong's economic growth. Nevertheless, fast growth of tourism and related service businesses increased the factor costs of Hong Kong and discourage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nology and high value-added industries. With limited scale and lack of policy support, many Hong Kong firms retained labor-intensive

business processes. After 20 years of swift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original mod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ese firms has also become outdated.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Chinese firm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strongest competitors of Hong Kong businesses. Additionally, the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rket scales of China and Hong Kong has led to brain drain in local industries. As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Hong Kong requires innovative measures to enhance its growth. It must leverage the immense resources of China to develop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position in the rapidly globalized economy.

Keywords

China-Hong Kong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novation

1997年，哈佛大學的恩萊特教授發表香港工業在國際市場上表現的競爭優勢報告，並出版了《香港優勢》一書。過往二十年，香港的競爭力已成為經常討論的課題。香港在不少國際性競爭力排行榜都名列前茅，例如在2016/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指數中，香港排名第9，在亞洲區僅次於新加坡和日本兩地。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2016年香港更繼2012年以後，再次奪冠。而聯合國的年度人類發展報告，香港亦名列12，為亞洲第一（見表1）。

這些排行榜都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加以肯定，香港的競爭力好像仍立於高峰。2016年香港GDP達到1.5%增長目標，貿易有所上升，全民失業率更低至3.3%，一切好像表現平穩。然而，在2016年12月倫敦大學商學院跟香港大學訪問了超過200位香港和內地的高級行政人員，當中有超過一半受訪者都對香港前景感到悲觀，並認為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將

被新加坡或上海取代。回歸二十年來，到底香港的競爭力是進還是退？為甚麼一方面香港的競爭力好像傲視世界，另一方面港人對經濟感到悲觀，企業和社會都好像缺乏活力？要瞭解這種矛盾的情況，就要從回歸前的香港發展開始討論。

表 1 香港在不同組織 / 機構的競爭力報告中的排名

	世界經濟論壇	IMD	人類發展指數	經濟自由度
1997		3	22	1
1998	2	5	25	1
1999		6		1
2000		9	26	1
2001		4	24	1
2002		13	23	1
2003		10	26	1
2004		6	23	1
2005		2	21	1
2006	10	2	22	1
2007	12	3	21	1
2008	11	3	21	1
2009	11	2	24	1
2010	10	2	21	1
2011	11	1	13	1
2012	9	1	15	1
2013	7	3	15	1
2014	7	4	15	1
2015	7	2	12	1
2016	9	1	-	-

香港的經濟轉型歷程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先進工業國家的經濟持續增長，加上自由貿易主義抬頭，關稅和貿易壁壘相繼減少，這為以出

口為主的製造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經營環境。香港藉英國殖民地的身分，在出口貿易上享受了一些稅務優惠和便利。在國際市場需求殷切，對手又不算多的情況下，出口擴張成為香港工業發展的推動力。¹與此同時，香港政府亦在六十年代開始為工業發展提供更大的支持，這包括制定有關法例，並成立香港工業總會、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生產力促進中心等，都為香港製造業的發展，在對外推廣、促進投資和加強人力資源上提供更良好的支援。

香港製造業大多屬於加工裝配性質的勞動密集型工業。企業規模以中小型為主，在工業大廈營運。雖然香港土地資源缺乏，但擁有從內地湧入的大量廉價勞動力和技術，加上自由港政策讓企業能取得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半製成品，所以毋須太多自然資源的輕工業便得以發展起來。香港的製造業工廠，從1960年的5,346家增加至1970年的16,507家，製造業工人的數量從22萬人增加至近55萬人。香港出口產值更上升三倍至超過120億元。六、七十年代的製造業主要集中在紡織、製衣、電子、塑膠四個行業上，從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這四個行業佔香港出口的比重，由六成多升至七成。而香港的出口市場亦十分集中，六成以上產品主要輸往美國、中國、德國、英國和日本。這種集中的情況，讓香港這相對小型的經濟體能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取得更好的發展。

七十年代初期香港成為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成員，而歐美各地亦先後撤除針對香港的貿易障礙措施，例如香港獲得發展中經濟體系的待遇，更助長了香港工業出口的發展。然

1 林聰標：〈香港貿易結構與經濟成長〉，載邢慕寰、金耀基合編《香港之發展經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而，由於紡織和成衣品受到歐美國家的入口配額限制，所以香港的紡織業和成衣業在七十年代增長放緩，而不受配額限制的電子、玩具和塑膠等行業則得以大力發展。六、七十年代非紡織品出口值，平均每年達 38.1%。² 香港的製造業開始變得多元化，而電子業亦在七十年代後期取代了紡織業，成為香港製造業中僅次於成衣業的第二大行業。

總括而言，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經歷了第一次的轉型。政府和企業家成功把握機遇，讓香港發展成亞太地區紡織業、成衣業、電子業和塑膠業的工業中心，將產品銷售到歐美日不同國家。雖然市場偶有起跌，但由於香港企業以勞動密集的中小企為主體，加上勞動市場效率極高，工資價格極具彈性，在資本和勞工不缺的情況下，香港的製造業能有效適應經濟周期，在全球經濟低迷時仍能把握機會擴張。

香港製造業的生產總值，從 1970 年的 59.13 億港元持續增長至 1989 年的 860 億港元，但製造業佔香港 GDP 的比重，卻從 30.9% 下降至 18.3%。這反映出製造業在香港經濟的地位在八十年代漸被服務業所取代。香港的經濟迎來第二次轉型。香港政府成立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以研究香港經濟邁向多元化的方向和政策。委員會於 1979 年提出報告，包括六項重點建議：加強中港貿易及經濟關係、增加工業用地供應、推廣金融及服務行業、加強工業訓練及教育、加強工業及技術支援，以及推動香港對外貿易。總體方向就是希望提升香港製造業的技術，推動香港的金融和經貿服務業發展。

第二次經濟轉型，讓香港經濟得以在八、九十年代持續增長。香港製造業在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已飽受勞工成本上升、

2 香港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1979 年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報告書〉，1979 年。

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競爭加劇等問題困擾。八十年代香港失業率屢創新低，當中更出現 1.1% 的歷史低點。到了 1999 年，香港的工廠數目已下降至 20,380 間，香港廠家把生產基地遷移至珠三角一帶。這次轉移不單讓廠家能享受內地低廉的工資和土地成本，更隨着規模和產能擴大，得以享受規模經濟效應，增強競爭力。香港的製造業出現了所謂前店後廠的格局。隨着製造業內遷和擴大，對香港的商業服務需求更為殷切，讓香港的金融業和貿易業，在八、九十年代得以急速發展。這次結構轉型讓香港的資金和人力資源投進較高增值的服務業，讓勞工生產力能得到增長（見下表），奠定了香港成為亞太區金融和航運貿易中心的基礎。

表 2 勞工生產力平均年增長分項比重

	1986-1995	1996-2005	2006-2015
勞工生產力增長	5.2	2.2	2.1
帶動因素：			
經濟轉型	1.5	0.3	0.1
產業升級	3.8	1.9	2.0

來源：香港經濟近況（2016）：〈從結構角度分析香港勞工生產力增長〉，<http://www.hkeconomy.gov.hk/tc/pdf/box-16q1-c1-3.pdf>。

工業轉移並非新事物。從七十年代開始，歐美等發達國家便出現服務業佔生產總值比重上升至六成以上的情況，這引起了學者對產業空洞化的討論。產業空洞化指一個國家的基礎生產能力出現廣泛性的資本撤退³，並因此造成就業機會減少，帶來經濟危機。特別是原有產業退出，新產業未能充分發

3 Barry Bluestone & Bennett Harrison,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Plant closings, Community Abandonment, 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展，就更可能形成衰退。亦有學者認為，產業空洞化實際只是經濟服務化的另一描述。隨着全球一體化供應鍊出現，歐美國家把低增值的生產工序移到國外，高增值的金融服務和信息服務業、高科技產業便主導整條產業鍊。就像紐約時報估算，每部 iPhone7 材料和製作成本為 US\$400，而售價為 649 美元，讓蘋果取得四成的毛利⁴，但生產組裝商的分成只有大約成本的百分之七⁵。由此可見，產業轉移是得是失難以預料，最重要是在工業轉移後，當地經濟能否過渡至高增值產業又或是新的產業能否讓經濟維持增長動力。

隨着產業轉移，對外貿易業成為了香港經濟中最大的產業部門。1980 年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23.7%，而進出口貿易業則佔 10.7%。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進出口貿易業在 1991 年超越製造業，到 1997 年，進出口貿易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17.7%，而製造業只餘下 6.5%。對外貿易業的急速亦是香港各行業增長背後的推動力。它不單是內地香港製造商的重要伙伴，它更推動了香港的貨運、金融、保險，以至旅遊和通訊等行業的發展，讓香港發展成國際貿易中心。在九十年代，香港的主要貿易伙伴，從歐美地區轉移至中國內地和亞太地區。雖然香港出口產品市場仍以歐美國家為主，但是九成以上香港的轉口貿易均與中國內地有關。

自 1984 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香港地產市場開始出現較為長期的升浪。1992 年中國擴大對外開放後，香港的樓價更不住上升，地產業的賣地收入和稅收，佔香港政府財政收入兩

4 <https://www.nytimes.com/2016/12/29/technology/apple-iphone-china-foxconn.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 月 15 日。

5 <http://www.nytimes.com/2010/07/06/technology/06iphone.html>，瀏覽日期：2016 年 12 月 20 日。

成以上。地產發展行業需要大量資金，也是香港金融服務最大的參與者之一。與此同時，在捱過兩次較大的金融危機後，香港逐漸加強對金融業的規範，並發展出由中國和歐美日國家資本集團主導，高度國際化的金融體系。到 1997 年，金融業的增加價值已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10.1%，成為僅次於進出口貿易和地產業的第三大產業。

跟製造業最大的分別，是金融業、房地產業、進出口貿易和公用事業等領域都由大型企業主導。雖然香港仍有大量中小企業，但這三個行業都需要投入大量資源才能有所發展，中小企能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小。在服務業的快速增長下，從 80 年代開始，香港通貨膨脹高企至雙位數水平，到 90 年代中期通脹仍維持在大約 9%。持續高通脹令生產成本上升，不單侵蝕香港經濟的競爭力，更令較低增值的製造業甚至服務業難以在港發展。在高地價高租金的環境下，地產行業能賺取豐厚利潤。部分擁有大量廠房和資產的製造商甚至服務業，都開始「不務正業」，把業務縮減甚至關閉，改為投資房地產發展或租務業務。

回歸後的轉型

隨着香港回歸，行政長官董建華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已明確表示，面對工業北移和成本上升，香港產業必須進行結構轉型。⁶ 在第二份施政報告，董特首更以把香港打造成紐約和倫敦等國際都會為目標。⁷ 報告表示將來的香港不但是「中國

6 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董建華施政報告：《共創香港新紀元》，1997 年 10 月。

7 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董建華施政報告：《群策群力，轉危為安》，1998 年 10 月。

的一個重要城市」，更是「亞洲的首要國際都會」，匯聚各類人才、資金，經濟活力充沛，為亞洲地區以至全世界提供優質金融、商業、物流和旅遊等服務。在 1998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展開為期兩年的研究諮詢，並於 2000 年 2 月發表題為《共瞻遠景，齊創未來》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進一步肯定香港的定位，並提出如要實現這目標，更需要掌握七個關鍵行業：金融和商業服務、跨國企業地區總部的業務、旅遊業、資訊服務和電訊業、創新和科技、貿易運輸及物流服務，以及創作和文化活動。⁸

回歸後香港的製造業進一步消失。製造業的增加值從 2000 年的 613.99 億港元逐漸下跌至 2011 年的 305.78 億美元，製造業佔香港生產總值的比重更下降至只有 1.6%。誠然，本地生產商把裝配活動移入廣東，香港公司只保留產品設計、市場推廣和生產規劃等，所以在統計上可能歸入了服務業而非製造業。金融、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旅遊等四大產業在本地生產總值所佔比重持續上升，從 1998 年的 49.6% 上升至 2015 年的 57.2%。除了四項支柱產業外，特區政府亦提出要發展六項優勢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醫療產業、教育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檢測及認證產業和環保產業。

雖然香港政府提出多個願景，但向高端服務業的轉型並沒有如預期般順利。自 1997 年回歸以來，香港經歷了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2001 年 911 事件、2003 年 SARS 以至 2008 年金融海嘯事件等外部衝擊，多次陷入經濟衰退。特別是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令香港陷入數年通貨緊縮，本地總值要待

8 香港發展策略委員會：《共建遠景，齊創未來——香港長遠發展需要及目標》，2000 年。

2005年才超越1997的水平。在維持聯繫匯率的情況下，香港經濟無法依靠聯繫匯率來進行調整，結果是港元資產價格持續下調，令投資和消費大量北移至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地區。

2003年開始，中央政府與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以及補充協議，並推出自由行政策，以支持香港金融、商貿和旅遊等服務業的發展。CEPA的簽訂，加強了香港跟國內經濟的重新分工和整合過程。CEPA的落實，讓香港產品能零關稅輸入內地，並讓香港的貿易和服務更易進入內地市場。雖然由於不同行業的制度差異，若干行業資業資格的相互認證發展緩慢，但繼製造業後，香港一些服務業亦已遷移至內地。

內地的「自由行」政策令訪港旅客大增，內地訪客數字從2003年的840萬人次，上升至2016年4,580萬人次。旅遊業成為了香港經濟主要推動力之一。有學者批評旅遊業只佔香港GDP的5%以下，自由行的貢獻被誇大了。然而，根據林本利在2014年做的評估，這計算方法忽略了自由行對旅客服務相關產業的貢獻。旅客數字下跌，不單令零售業受損，更會影響其他相關行業如貿易、批發及物流業，以至銀行、金融、地產等都會受到影響。⁹旅遊業的發展不單帶動消費，也提供大量就業職位，讓香港的GDP和市民的收入得到增長。

回歸二十年的挑戰

易經序卦傳說：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和困是

9 林本利(2014)：〈旅遊業對香港經濟貢獻全面評估報導〉，瀏覽日期：2016年12月20日。<http://liberal.org.hk/tc/component/content/article/26-press-releases/1023--20147.html>

一體的兩面。當一個人，一間企業，一個地方不斷發展，總有一天會到達困頓之局。回歸以前，香港已經歷了多次的經濟轉型。每次突破困局，香港都再提升至另一層次。現在又是否如此？

香港產業升級的障礙

在香港製造業北移後，香港廠商把握內地的機遇，不單提升了個別企業的規模，還推動了內地的經濟轉型，協助把中國打造為「世界工廠」。香港的廠商認為「前店後廠」的模式只是令他們的角色有所變化。讓香港把資源集中於產品設計、市場推廣、品牌管理等高增值環節，利用香港這國際城市和擁有優質商業服務的優勢，打造更強的製造業。但這想法沒有想像中容易，他們未能像歐美國家的製造業般在科技上成功升級。¹⁰

隨着製造業以大規模北移的策略應付成本及競爭壓力，香港製造業必須升級改造，才能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九十年代，傳統製造業的貢獻有所下降，資金投入新的製造業去。製衣業的生產總值，從佔香港生產總值的 19.7% 下跌至 14.7%。塑膠和電子玩具產品的生產總值跌幅更為顯著，分別為 -67% 和 -54%。¹¹ 而較新的行業包括印刷出版、化學品和辦公室器材製造則有所上升。相對以往而言，本地廠商已着力投資資本密集的生產活動，不過這些升級轉型只見於上述幾個增長較快的行業，並沒有在八十年代的主要工業中出現，主要原因是企業規模太小、成本太高和缺乏支援。

10 Chiu, Stephen W. K., K. C. Ho, and Tai-lok, Lui, 1997. *City-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月刊》，1998 年 12 月。

一直以來，香港的企業九成都是規模低於 20 人的小型企業。¹² 在 1973 年，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產值，佔香港製造業總產值的 93.5%。¹³ 六十年代初，香港的工廠平均僱用 41 人，但這數字持續下降，到 1980 年只有 20 人，到 1995 年更下降至 12 人。足見隨着八十年代香港製造業大舉北遷，留港的工廠持續小型化；超過九成的工廠，僱用人數都在 50 人以下。部分香港廠商把握北上的機會擴充業務，享受規模經濟效益。但超過五成港商在內地仍不會僱用超過 200 人，超過一千人的其實只佔 7.6%。小型企業擁有靈活的優勢，但就難以籌集資金作出更長遠和大型的計劃。在各小型廠商中，經常會進行研究開發的企業不足兩成半。

進入九十年代，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勞動成本和土地成本已大幅上漲，加上東盟國家的工資較廣東便宜，都對以勞動密集式生產的港商造成極大經營壓力。然而，港商並沒有因此投入更大資本作產業提升。港商沿襲傳統的發展模式，把工廠遷入土地和勞動成本更低的內地省份，又或透過聘用大量來自外省的勞工，以降低成本，維持競爭優勢。當時不少廠商更常把「Low tech 撈嘢，high tech 揩嘢」掛在嘴邊，意思是只要繼續做代工接外國訂單就能賺錢，大舉投資研究開發，就只會蝕本收場。有長遠眼光，把企業產能升級發展的港商並不多。

表 3 二十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香港製造業的工廠數目與僱員人數

年份	工廠數目	僱員人數	每間工廠平均僱員人數
1960	5,346	218,405	41
1965	8,646	341,094	39
1970	16,507	549,178	33

12 香港政府統計處：《就業、職位空缺及薪金總額統計報告》。

13 饒美蛟著〈香港產業結構的轉型——兼論香港華南經濟一體化的構思〉，香港《信報財經月刊》，1993 年 12 月，頁 37-38。

1975	31,034	678,857	22
1980	45,409	892,140	20
1985	48,065	848,900	18
1990	49,087	730,217	15
1995	31,114	386,106	12

除企業規模較小和較為機會主義外，其實早於 1998 年瑞士 IMD 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已指出，香港的科技實力和人材質素都落後於其他亞洲對手。長期以來，在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下，香港的研究與開發投入，甚至是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投入，一直落後於新加坡和台灣等亞洲區主要競爭對手。加上回歸前大批專業人士移民海外，都令回歸後的香港在產業升級上更為困難。

前特首董建華於 2000 年宣佈，要在十年內大幅增加大專學額。在引進副學士課程後，每年中學畢業生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已升至六成。然而，這並不等於短時間內把香港的學生都變成能承擔企業科技發展的高知識科研人材。政府在推動大專化的過程中缺乏規劃和承擔。由於副學士是由自資院校自行推出，在市場需求下，有超過五成副學士課程均為工商管理有關的課程，課程種類不多，程度亦只等同大學的一二年級，缺乏專業性，加上部分課程質量良莠不齊，雖然在數字上大專人數大幅上升，但對企業升級沒有顯著的幫助。

即使回歸之後香港政府着力推動科研發展，但香港的研發支出只佔本地生產總值 0.73%，遠低於新加坡（2.1%）、韓國（4.2%）和深圳（4%），亦低於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 2%。科研投資不足，出路較少（2013 年只有 0.9% 人從事科技業），亦令高質素學生較少選讀科技、工程等科目，造成科研工程人員供應不足的問題。與此同時，香港大學院校過往十年在學術界擁有卓越的研究成就，但在應用研究投入卻十分

不足，取得專利項目不多。其中一個原因是現有大學體制偏重研究成果而非對社會的影響，加上本地缺乏高新工業，亦減少了大學推動應用研究的誘因。提升科研能力，並不是多開幾個學位就能成功。怎樣才能吸引更多科技企業來港發展？怎樣令更多資源投入至科技研究，讓教育和科技創新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推動力？政府應繼續積極不干預？還是應扮演更積極角色？這些問題，都要香港當權者重新思考。

跟內地整合的困局

已故經濟學者曾澍基博士，於九十年代初便就香港工業北移後的發展作出探討。在回歸十周年後，曾就指出香港與內地加強融合，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中港兩地在市場規模、人均產出水平以至制度和意識形態都有明顯差異，這種差異一方面代表雙方可互補的領域甚多，但同時也會出現取向分歧、發展速度差異和相互競爭的問題。隨着政治、經濟和社會邊界的障礙越來越少，兩地資源流動增速，更會隨着資源流動出現更多問題。關鍵是香港能否在這時候保持其優勢，讓資源流進來呢？

對任何經濟體系來說，開放資源流動，意味着資源可以流入，也可以流出。只有一個地方能擁有本地優勢，才能保留或吸引更多的優質要素進入 (Krugman, 1991)。換句話說，能擁有明顯優勢的行業，會在這次融合中受惠。而沒有優勢的行業，則可能面對更大的競爭和資源流失。在四個支柱行業的服務業中，香港的金融業較內地有明顯的優勢，所以在這十年，金融業例如銀行、保險和證券仍有不俗的發展——但這發展亦要面對上海和深圳的挑戰。上海金融業於 1990 年起步，中共十四大報告提出了「儘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在往後二十多年，隨着中國經濟成長，上海的

金融業急速發展。九十年代初，香港的存、貸款總額是上海的12倍以上，而到了2014年，兩地的存貸款額已相若。在1993年，香港股市成交額是上海的4倍，2015年上海股市的成交額是香港股市的7倍。雖然內地在校治、資訊流通、監管透明度及貨幣自由兌換等方面均令上海只能扮演內地金融中心的角色，未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但隨着國內繼續開放，香港跟內地金融市場既合作、又競爭的情況只會持續加劇。

物流業的問題更嚴重。九十年代，香港多次攀上全球貨櫃港口首席位置。隨着珠三角地區進出口貨量急增，香港港口活動增幅數以倍計，貨運成為了香港外貿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雖然簽訂了CEPA，但隨着全球紡織品配額限制撤銷、內地港口基建設施落成，珠三角地區的生產商毋須把成衣運到香港出口，可以選擇從深圳鹽田和蛇口等較為便宜的港口出貨。在2001年，香港港口處理貨量佔珠三角地區的七成，但到2015年已跌至三分之一。2015年香港港口吞吐量報2011.4萬個標準貨櫃箱，較上一年下跌9.5%，創13年新低。2015年全球主要港口的排名依次是上海、新加坡、深圳、寧波和香港。如果未來航運業未能提高增值，港口吞吐量可能會繼續下滑。

對外貿易亦有類似問題。前店後廠的模式能夠成功，是建基於香港和廣東以至內地擁有不同優勢。香港擁有豐富的海外市場經驗、準確商業信息和融資系統，廣東則擁有低廉和充足的土地和勞動力。兩者在各有需求的情況下，自然能互相合作，組成有效的團隊。

然而，隨着中國經濟急速發展，中國亦開始從低增值的世界工廠，推動發展更高附加值和效率的業務。面對資源、土地及高質素勞動力的嚴重制約，廣東省委關於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便以「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全面提升產業素質」為綱，提出提高九大產業技術和培養新產業的發展方向。

在這情況下，原有的格局便出現問題。雖然香港跟廣東關係密切，但香港在內地的企業只屬於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在科技和創新上欠缺優勢，不單未能成為廣東省進一步發展的助力，更可能就是廣東常掛在嘴邊要進行「騰籠換鳥」的目標。

2008年時全球金融危機後，廣東加強「騰籠換鳥」。政策實施數年後，廣州、深圳、珠海、東莞等地轉出企業超過4,000家，但同時引進企業超過14,000家。2010年珠三角地區現代服務業佔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達到60.8%，並大幅增加先進製造、高技術製造業的比重。香港的製造業不單未能升級轉型，更面對經濟低迷、利潤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困擾。後來居上的國內企業，亦漸漸成為港商的勁敵，有部分港商只能把生產基地移至其他更便宜的東南亞國家，希望能維持以往的優勢。¹⁴

另一例子是香港的電影業。自1990年代初至今，香港電影業步入長達幾近20年的低潮。香港政府推出電影發展基金，為電影製作提供二千五百萬的資助，以鼓勵香港電影業發展。並向基金注資2億，以提供二千萬元資助港產電影進軍內地的宣傳費用。然而，這些金額都未足以讓香港電影有較大復甦。香港電影在1992年票房達12億4,000萬，到2015年只有3億8,400萬，只及高峰期三成。業界面對問題包括：物業價格上升，大型電影院相繼拆卸（1993年電影院有有過十二萬座位，到2015年已減至四萬個以下）；家庭娛樂增加，電影面對激烈競爭；進口電影吸引大量觀眾，佔據香港票房八成份額；海外市場對香港電影興趣減弱，海外票房亦下挫八成；最

14 香港工業總會（2015）：《珠三角製造——香港工業未來的出路》，香港：香港工業總會。

後是盜版和網上侵權問題等。本地票房大幅大跌，那香港電影業是處於怎樣的光景？

受惠於《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香港電影製作人獲得進入內地市場的優惠待遇，包括電影不受外國電影適用的配額所限制；香港與內地合拍的影片視為國產影片；可經營電影院及港產粵語片可透過指定渠道在廣東發行。由於內地電影市場過去十年年增長率達四成，內地票房在2015年達到440億元人民幣，吸引不少香港電影製作人北上發展。2010至2014年間，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已超過五成。香港電影人從內地取得較多預算，而合拍片亦吸引到較具吸引力演員參與，搶佔內地票房14%。2005年至2014年間，香港的電影業在業務收益累計增加三成以上。然而，未來香港電影業會否繼續享受優勢？一來，內地電影企業已漸趨成熟，這或會減少香港電影製作企業參與合拍影片的機會。二來，從近年內地十大最高票房的國產電影中，合拍影片所佔數目逐漸減少可見，內地電影公司已逐漸主導市場。最後，隨着外國電影的配額制度進一步開放，香港電影要面對更強大的國外對手競爭。香港電影業能否再進一步，實在存在不少疑問。

總結來說，在回歸後，由於香港在對外貿易、金融、物流和商業服務等領域擁有較為領先的地位和優勢，所以在跟國內的合作上能扮演互惠互利的角色，香港的製造商亦利用內地較便宜的土地和勞動力獲得國際競爭力。然而，隨着內地急速發展，進入產業升級轉型階段，香港跟廣東原有的合作模式無可避免地受到衝擊。部分產業如物流業和對外貿易，內地企業已成為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由於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以往香港並不在廣東的規劃之內。即使近年粵港內地在規劃上加強合作，但香港和內地都已經在多個領域中展開競爭，內地已非當年為香港提供轉型力量的基地，雙方如何能互相配合取得優勢

已經不易。再者雖然兩地政府多次表示要加強合作，但港府實施積極不干預政策，較少扶助個別行業，部分業界希望港府能加強支援和指導，但得到的支持難以跟內地政策相比。加上近年香港的社會環境對政府推動中港融合有所抗拒，都令兩地更難有效合作。從電影業亦可見，香港企業跟內地的差距不斷收窄甚至已被超越，在這情境下，香港政府如何增強香港自身的競爭力？香港如何才能成為亞洲的大都會？這是未來香港發展的重要課題。

創業活動的改變

回歸以前，多項調查均指出香港人極具創業精神，很想把握機會創立自己的事業。¹⁵ 由於製造業由中小企主導，大部分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門檻並不高，不少擁有經驗和技術的工人累積資本後，會憑本身的技術和人際網路創業。¹⁶ 很多時，一些較大型的工廠或貿易公司，成為了海外買家和本地廠家的中間人，在接單後把部分工作外判給其他代工工廠來承包。這承包系統，促成了恩萊特教授等學者在 1997 年所著《香港優勢》一書中論述的快速、靈活和適應力強來保持競爭優勢。這個龐大的外判承包系統，不單讓香港製造業擁有靈活彈性的生產方式，更成為孕育企業家的場地。¹⁷ 雖然成功不易，但在這種環境中，更多人會作出創業的嘗試。根據香港統計署的數

15 鄭宏泰、黃紹倫 (1998)：〈試論香港人創業的動機〉，輯於劉兆佳等編《華人社會的變貌：社會指標的分析》，頁 393。

16 薛鳳旋 (1985)：《香港的小型工業》，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7 Wong, Siu-lun (1988),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字，在 1991 年，34 歲以下年輕人在本地僱主中所佔比例高達 25%¹⁸。隨着製造業北上發展，技術工人不單失去了原來擁有的職位，甚至因此減少了創業的機會。雖然沒有很確切的研究去分析香港製造業北上對本地創業的影響，但是港商把生產基地遷至內地後，整個外判承包系統將漸漸消失或跟其他廠商一併轉移至內地，本地技術工人可能失去憑自己技術能力創業的機會。¹⁹

香港大學王于漸教授以 30 至 39 歲在職人口的僱主比例來作為量度香港創業情況的指標。根據統計處的數字，30 至 39 歲組別中的僱主比率，由 1976 年的 4% 上升至 1985 年的 10.7%，到 1996 年回落至 7.1%，到 2014 年則降至 2.5%。反映從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創業活動仍不住增加，但到八十年代中期後，香港的創業活動便一直回落。反映這次經濟轉型對香港的創業活動甚至經濟活力有所影響。

回歸以後，香港的創業活動更進一步減少。王于漸教授分析主因是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香港陷入六年通縮衰退，不單消費物價下跌 11.6%，累計 GDP 亦下跌 17.5%，實質利率更升至世界大戰以來的高峰，經濟活動大受影響。此外，隨着生育率急劇下跌，香港工作人口年齡中位數由 1981 年的 32 歲，升至 2011 年的 40.6 歲。適齡工作人口老化，年輕具創意的人未必能累積創業經驗和技術，加上勞動市場供應緊張，

18 <http://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516rb04-challenges-of-manpower-adjustment-in-hong-kong-20160607-c.pdf>，瀏覽日期：2016 年 12 月 20 日。

19 Lui, Tai-lok and Thomas W. P. Wong, 1994.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context". Occasional Paper No. 38.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都令創業率有所下降。「全球創業觀察」的調查，香港的總體創業率逐漸下跌，在 2004 年更跌至 3%，排名倒數第五。「全球創業觀察」發現創業活動和人均生產總值呈 U 型關係。由於香港人的收入屬中等水平，正屬這個 U 型的底部。既不用為生計創業，也沒有太多具吸引力的機會刺激他們創業。加上香港創業成本高昂，亦令創業更為困難。然而，可喜的是近十年香港的創業率有反覆回升跡象。在自由行推行三年後，香港的創業率已從 2004 年的 3% 回升至 2007 年的 10%。可惜是在金融海嘯的打擊下，2009 年再次回落至 3.6% 水平。然而，自 2011 年起，新註冊本地的公司數字都維持在十四萬水平，比 2009 年以前的不足十萬為多。或許在互聯網和電子商貿的普及化下，更多人能以較低成本創業。

結語

在 2000 年以前，香港一直是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重要樞紐，香港的貨運貿易遠超內地各大城市。然而，隨着中國在 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香港的貿易額雖然有所增加，但增速已被上海拋離。在 2014 年，香港的本土出口只佔貿易總額 0.7% 左右，而上海則保持在 20%。在香港的不干預政策下，企業沒有像其他亞洲對手如新加坡、韓國般提升產業競爭力。在兩地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差異下，香港跟珠三角地區只能作出有限度整合，亦未有藉此打造出更高競爭力的產業。港商仍維持其中小企規模，憑敏銳觸覺適應市場變化的運作方式，替內地經濟服務。然而，隨着內地進一步對外開放，香港在外貿的重要性已逐漸下降。

《愛麗絲夢遊仙境》有一段經典對白：

愛麗絲問：「這裏是哪裏？」

精靈反問：「你想要去哪裏？」

愛麗絲說：「我不知道。」

精靈：「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裏，那麼你現在在哪裏一點都不重要。」

回到本文的起點。從 2012 年到 2016 年，香港在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排名一直在 7 至 9 名徘徊。從競爭力排名看來，香港的競爭力好像還不錯。當中以基建排名第一，由於香港崇尚自由市場，所以市場效率、勞工市場和金融市場等範疇均名列前茅。香港的資本並不缺乏。不單香港政府擁有豐厚儲備、香港還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擁有良好的法治和有效率的市場，且是鄰近世界最龐大的市場。問題是：未來該怎樣走下去？

競爭力報告亦指出，香港最大的營商困難包括「沒有足夠能力去創新」、「政府官僚」、「通脹」、「有限制的勞工法例」、「沒有足夠教育程度的勞工」及「政策的不穩定」，可見人力資源、經營成本和政治不穩定已成為香港較為嚴重的問題。

香港政府一直強調要發展「知識型經濟」，但香港的經營環境和企業行為並沒有向這方向發展。香港的研究及發展（R&D）開支佔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亦偏低。雖然香港特區的研發開支佔 GDP 的百分比已從 1998 年的 0.44% 升至 2015 年的 0.73%，但這跟經合組織成員國平均比率約 2% 還有一定距離。可見在崇尚積極不干預和自由市場發展的情況下，香港企業傾向機會主義，並不熱衷於升級轉型。競爭力報告中表現較低的項目包括衛生與基礎教育（排名 26）、市場規模（排名 33）和創新（排名 27）。1991 年，15 歲及以上人口中，教育程度只有初中以下學歷的佔 57%，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到 2015 年，初中或以下學歷仍佔人口 34%。在香港的初級教育質量排名 27，而初級教育的普及率更排名 76。在創新項目

中，表現較差包括企業花費在科研較低（排名 34）和科學家和工程師的供應較少（排名 43）。可見人力資源的質和量，對香港未來能否走向知識型經濟亦是一大制約因素。

回歸以來，香港一直面對發展本土經濟、跟內地融合的拉扯。在 2002 年財政預算案列出「需要增加與腹地，特別是中國內地，在經濟領域的流通，保持香港作為區內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隨着中央救港措施推出，2004 年更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分水嶺：中港融合已被視為香港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只可惜是在政策大力推動中港融合，卻未有大力投資產業升級的情況下，香港一切發展只着眼配合內地龐大市場的無限商機——無論是基建發展、產業開發，都配合着內地的經濟規劃。雖然香港政府好像保持以往的不干預制度，但其實已漸漸變成由內地市場主導香港產業發展方向。就如電影業的例子，面對內地龐大市場的吸引力，不少香港電影企業的資源都投進其中，賺取豐厚利潤。然而，當大部分電影製作人材都流到內地發展，在市場競爭中，內地電影業得到長足進步，但香港企業未有系統地培養人材和提升技術，長遠競爭力能否維持下去，就成為一大問題。

把握中港融合的機遇推動經濟發展絕不是壞事。但只顧賺取眼前利益，缺乏對香港競爭力的長遠規劃和培養，就變成了飲鴆止渴。按自由市場的邏輯，企業的資源都集中在最能賺錢的行業中。但對一個城市而言，這是否最好的選擇？美國作家 Jane Jacobs 於 1961 年出版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探討一個城市如何能運作有方。她認為一個城市要成功，需要鼓勵產業多元化，甚至看似無序的發展，才能為城市帶來創新和動力。就如一個生態系統維持生物多樣性，讓系統更具彈性，更能適應不同環境的變化。過度依賴若干產業，可能讓利益集團干擾調節機

制，減低社會和經濟的適應力。就如自由行政策，內地大量遊客湧入，確實讓香港企業受惠；但讓香港零售業變成只為自由行旅客服務的行業，對香港的長遠發展又是否好事？近年自由行政造成的政治經濟問題，亦已陸續浮現。怎樣保持經濟多元化和平衡政經發展，刺激本地創業以維持經濟活力，將會是香港政府未來的挑戰。

以上的討論，只是提綱挈領，並不完整，旨在拋磚引玉，刺激思考。香港未來該如何發展？應由誰主導發展？香港政府應否改變以往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更積極地推動產業多元化、產業升級和創新等發展？這些問題都要留待有能者去思考、解答。然而，在中國繼續保持開放政策和全球化的發展下，香港仍會更進一步跟中國，甚至全世界融合和競爭。在這洪流中，如何發展出香港的優勢，把資源吸引過來，是香港長遠經濟發展的最大課題。期望香港重新能尋找到自己在中國、以至全世界的位置。